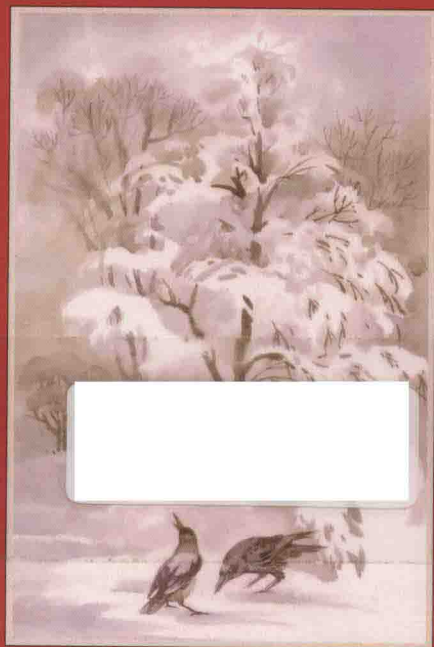


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集

王晓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集

王晓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集/王晓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309-11994-7

I. 怎… II. 王… III. 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63 号

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集

王晓平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吴 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325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994-7/I·96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辑 “新女性”,歧路彷徨

第一讲 “新女性”还是“旧淑女”? 身份焦虑与文化虚无感

——张爱玲研究 38

第一节 如此苍凉,如此彷徨 43

第二节 身份焦虑与“幽默”的讽刺 84

第二讲 “新女性”的双重陷阱:“贤妻良母”还是“自由新女性”?

——梅娘研究 102

第一节 “新女性”欲望的溃败与绝望 104

第二节 “新青年”的蜕变与“新文化”的无效 108

第三节 从“新女性之梦”到关怀底层民众 116

第二辑 “新-新女性”,命运多舛

第三讲 “新女性”之死:徘徊在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

——萧红研究 124

第一节 从“左翼文学”出发:人道主义精神的天然萌芽 126

第二节 “抗战文学”的滥觞:民族主义与性别话语的龃龉 129

第三节 “讽刺文学”的尝试:不成熟的《马伯乐》 138

第四节 “诗化小说”:《小城三月》与《呼兰河传》中的
“文化反思” 141

第五节 “新女性之死”:徘徊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	151
第四讲 从“新女性”的困惑到“新-新女性”的决断:“现代性” 与“新女性”的跋涉之路——丁玲研究	156
第一节 “新女性启蒙话语”,还是市民阶级身份难产的症候?	160
第二节 “革命加恋爱小说”:市民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文艺?	169
第三节 如何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文化工作者?	175
第四节 如何创造“革命新文化”?	182
第五节 革命现实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8

第三辑 “新青年”:浪漫派?现代派?先锋派?

第五讲 现代派?先锋派?“新文人小说”的自由主义观念史 ——无名氏研究	212
第一节 通俗悲喜剧:解构“中产阶级罗曼史”	214
第二节 《无名书》:“哲学小说”还是“文人小说”?	223
第六讲 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代志怪传奇”中的虚幻 世界主义——徐訏研究	233
第一节 虚幻的世界主义与流产的浪漫史	235
第二节 “普遍人性”的不可能性	239
第三节 政治焦虑中的“普世主义”文化幻想	245

第四辑 “新-新青年”:“新左翼”?新农民?

第七讲 “新-新青年”的彷徨:个人主义的无效与“反成长小说” 的形成——路翎研究	254
第一节 《饥饿的郭素娥》:人民“原始强力”与伪主体性问题	258
第二节 《财主的儿女们》:“主体性”的丧失、寻求与失败	267
第八讲 “新农民”的阶级意识困境:“问题小说”中的“农民故事” ——赵树理研究	293
第一节 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	295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与新政权	298
第三节	女性和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解放”	307
第四节	“赵树理方向”的另类现代性？	314

第五辑 谁之主体性？何种文化政治？

第九讲	“市民阶级”的主体性？“主观战斗精神论”的文化政治——胡风研究	322
第一节	处于危机中的“现实主义”写作	326
第二节	文学的典型性与历史要求	333
第三节	理论的历史性	338
第四节	为了建立市民阶级主体性	345
第十讲	“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生成与难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349
第一节	阶级意识与主体身份	352
第二节	新的集体生活形式与新型美学胚胎	365
第三节	“革命新文化”与“新主体性”的困境	368

导 论

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话题持续得到关注。尤其是海外学者王德威所提出的命题“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个提法来自他在台湾出版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本论文集^①。它的含义在他另一本在内地出版的论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变得更加明确^②。这种“想象”并非是19世纪80年代对于文学创作做出属于“感性思维”的区分的那种含义,而是将它作为连接实际的历史发生和作家创作之间的媒介。这种“想象”内在包含了“幻想”、“梦想”、“空想”、“预想”等等含义。表面看来,它是一种“中介”;其实,它和曾经备受批评的简单的“现实反映论”的逻辑一致:如果说后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那么这种“想象论”认为文学作品是“想象”现实(或“想象中国”);二者同样缺乏的是如何进行“反映”或者“想象”的中介。这种“想象论”既是研究者本人一向操持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方法的逻辑结果,也是这种“新历史主义”观念指导下的“想象史学”和政治理念的一个投射或折射(它认为历史本身不可知,而只能依靠想象)。其实,对于生活在其间没有历史距离、实际参与了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的文学创作者来说,对于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实际斗争,永远并非单纯是由“想象”得来的“理想”或“幻想”的产物,而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不足、错误乃至罪恶,出自不同立场与理念得出的现实性救治方案。而以发生在较为久远的过

①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湾:麦田出版社,2008年。

②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去的历史事件、社会和人物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依靠“想象”。但这种想象并非是基于这种后现代史学认为的历史不可知论,而是基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义上的作家在当下自己所秉持的历史观、政治观、人性观对于过往时代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认识,对于历史事件性质的判定,也就是基于作家的“政治无意识”。

然而,无论现当代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们的立场如何,他们大多都认为这个“新”的社会应当在民众的政治参与上更加民主,在阶级等级上更加平等,拥有民族独立,在社会中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简言之,对于拥有阶级性内容的公平、正义的“现代”价值的追求,超越了对于建立在宗法社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基础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奉。这种对“现代(的)中国(的)”的追求同时是争夺文化领域内的领导话语,而后者是对如何进入“现代性”(一直以来被理解为如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或如何进入不同路向的“现代性”的竞争。

于是,在这一总体形势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小说创作和文论思辨。它们是对变动的历史经验的记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心中或清晰的政治-社会视野,或其“政治无意识”的具象结晶、表达、连接或投射在这种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对不同现代性进路的调商、幻想、反思和争夺。因此,笔者认为,“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这实质上预设了“现代”只能是单一面孔的议题或应转换其思路,从“怎样现代,如何文学”这一方向重新思考。

在本书中,这一再思考是在与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中进行的。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介绍进中国内地以来,深受国内学界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系统性的与之对话的专著问世。笔者留学美国八年,曾通读大部分相关研究论著和论文,在吸收其方法论和具体论断的精华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与其展开商榷和对话的冲动。这本

选集择取中国现代八位著名作家作品和理论文本,在对其海外解读的方法论和论点进行介绍评析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解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再解读”的实践。

一、“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的反思

一谈到“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马上就会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海外传进来的“再解读”实践。由旅美学者唐小兵编辑、由其时众多知名研究者的论文组成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1993年在香港出版,在海内外学界产生过不小的轰动,曾经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此后国内陈思和等人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很大意义上是这个思路的继承和延续;2007年由北大出版了增订版,仍然引起国内的关注,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再解读’学术现象”^①。那么,本书的“再解读”与其相比有什么不同?

表面上看,这种研究是源由于那个时代的理论热,而后者接续80年代国内文化界的“文化热”的余温。它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各种文化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这既是对于80年代文化热中,在其时最为热门的文学研究界里热衷于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因此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引进所谓的“老三论”、“新三论”等“新方法论”的延续,也和当时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时兴浪潮有关——这些研究者不少具有海外留学背景^②。

① 参见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② 唐小兵谈道:“当时参与‘再解读’的一批学者,除了刘再复、戴锦华等人外,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在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或东亚系里受过训练的年轻学者,他们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些方法,比如更强调具体文本的分析,更强调中立化、学术化的语言,这些在当时的国内可能很有新鲜感。”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2页。

但是,在化用理论的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性”却也不容忽视。这种主体性也和从70年代末兴起而延续而来的“现代化”话语密切相关,后者间接带来了从80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浪潮。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对于传统教科书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多元化的阐释。它意图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显然,历史被重写、改写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重写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进行(因此和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理念影响下认为的历史不可知论,即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观念不同),而重新构建的理论依据及评级标准是“启蒙”观念和“现代化”话语,这实际上是摒弃了阶级分析理论并要取而代之^①。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一重写活动得到了具体文学史形态的理论表述而凝聚和加强。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发表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建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它“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它以反对“断裂论”的名义,要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界限和性质二分(所谓“要把‘五四’到

① 杨庆祥指出:“‘重写文学史’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要具体,是个案的研究,而且首先就是拿当代开刀的,我感觉就是当代实际上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参见杨庆祥、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钱理群在同一访谈中也说:“后来我也有反省,为什么当时我们忽略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呢?因为80年代的思潮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象征就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于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要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有现实原因就是,当时‘自由化’在现实中是受到压抑的,这样反而让我们更愿意接受‘自由化’,对我们来说,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摆脱出来。”

80年代的整个文学史衔接起来……要把20世纪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出来”^①),表明一种乐观的、也缺乏反思性的同一性史观^②。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这一概念是80年代有关“现代化”的论述的众多话语当中,“较早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世界/中国等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

文学时间上的“二十世纪”首先被确认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表现为一个持续展开的“文学进程”,即“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其总体特征则由“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悲凉”的美感特征、包括文体/语言在内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这四项指标来显示。这里所谓“文学系统”论,正如倡导者明确说明的,来自于一九八五年这一文学理论的“方法年”流行的所谓“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一。它由此将“古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切分为截然不同性质的两大块,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则成为由前者“走向”后者的一个时间“进程”,亦即一个“现代”比重逐渐压倒并最终取代“古代”/“传统”成分的过程。并且因为这一时间进程同时表现为“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这一空间性存在,与古代/现代的历时二元结构同构存在的还有“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中国”/“世界”这样的共时结构,两者共同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纵/

① 参见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2页。

② 钱理群后来说:“应该承认,在1985年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然也不会强调这样的知识背景,这又和我前面提到的当时急于从革命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这样一个思想状态有关。”这是因为“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参见杨庆祥、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横两大坐标。在这一文学时间表当中,一些文学运动和事件被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一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另一则是所谓“新时期文学”。正是观察到五四与“新时期”这两个文学时段或文学事件之间“非常相像,几乎是某种‘重复’”,观察到“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一个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他们才由此意识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完整性,即“一种躲在后面的‘总体框架’”。^①

这一“总体框架”即以“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回归文学自身”等作为它的重要目标和尺度。后者作为对受到全盘否定的“文革”的反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不容置疑的主导话语,而对其定语“社会主义”的内涵却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也成为不证自明的概念。“人的发现”、“重建主体性”成为当时社会号召回到“五四”式的个人主义的“新启蒙”思潮的流行口号,而这些是当时文化界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共识”^②。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以后,“新”的理论框架就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对立来以后者的“本真性”、“文学性”解构前者的“霸权”;这表明了进一步发展的对于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鄙弃,而没有意识到它自身是一种意识形态。贺桂梅进一步指出:

当时对文学“独立性”的倡导,显然应当看作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抗体制化的主导话语形态的方式,而其时的“旧概念”被不言自明地称之为“政治”。“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在当时是如此有效,以致批判前者就足以为后者的合法性张目。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将自身界定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并将前者指认

① 参见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② 根据钱理群转述,王瑶先生当初提出过批评:“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因为如此一来,20世纪就成了一个被选择过的20世纪了。参见杨庆祥、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为意识形态,八十年代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才据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它的“政治性”是内在于其所寄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而所谓“非政治”/独立性仅仅是为一种“新政治”张目的合法性手段。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八十年代,文学仍旧处于民族-国家机器的核心位置(即文学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因此,以“文学”的方式来播散诸种新意识形态,是更为有效的手段;而“文学”表述中所涵盖的“政治”叙述也更为丰富。^①

贺桂梅在回顾王瑶当时在对其弟子钱理群等人创造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所质疑的话“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时,切中肯綮地指出,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讲”的内容,“概而言之,便是遮蔽所谓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其视为一个内在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也因此抹去了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反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②。

而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无意识中指导下的具体操作方法,则是建立在“新历史主义”史观下对于过去的观照。什么是这种“新历史

① 参见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② 参见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这个文学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观点,认为晚清文学已经有现代性的萌芽,但被五四文学所压制戕杀。钱理群曾经回忆道:“王瑶先生还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文学提前,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五四’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晚清。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晚清文学是走向失败的,走向了‘黑幕小说’是一个衰败期。”参见杨庆祥、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看似有理,其实是犯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典型错误,即把系谱学的探询当作起源学的追溯。持这种文学观的人秉持经验主义方法论,没有看到晚清对于新观念、新形式的“实验”只是一种量的积累,这将通向五四文学的质的变异——从晚清文学的“烦恼意识”出发到五四现代文学“自我意识”的生成。参见拙作《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主义”史观?《再解读》的介绍这样说明这批学者所采用的方法:

虽然学术背景和学术路径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再解读”的策略是共同的:都是重新进入文本,试图重构文本的语境和体制,并由此进一步梳理和解释文本与泛文本之间的间隙、共谋、不对称和相互补充。^①

表面上看,这是注重文本和语境间联系的方法,并处理文本和“泛文本”(即语境文本)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对于“历史的文本化”有其自身的本体论预设,即“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历史观。它认为历史是不可知的本体,只能以文本形态显现自身。为此,研究者往往以今人的“人性”观念(也即自由主义的非历史性的人性观)移情代入对历史场景中人物和事件的演绎和认知。在近年来,这个立场越来越受到质疑,有人曾经这样归纳了批评观点:

“再解读”的学者注意到了“历史的文本化”,他们分析历史叙述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错位与张力,但会不会对“文本的历史化”审视不够呢?换句话说,是否会因为特别重视理论话语,而忽略文本当年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或者忘却了对自身今天发言的历史位置的反思。^②

贺桂梅曾经批评“再解读”作者在运用福柯、詹姆逊、结构或解构主义理论时,有点像处理一个不需要反省的、超越历史的、类似原则或公理那样的东西。她认为“不能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待理论,也不能以一种超历史的态度对待40年代至70年代这段独特的历史”^③。

对于这样的批评,当年的参与者唐小兵承认当时的“这些文章是

① 参见网上对该书的介绍。也参见袁陶陶《重写文学史的别样实践——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例》,《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第2期。

② 参见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5页。

③ 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上,第36页。

参差不齐的,包括我自己文章在内的一些论文也还有些偏执,分析并不全面,还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性”^①,也承认这样的“再解读”不是很完整的解读方式。但他同时这样辩解道,(任何)“再解读”都不“能回到周立波当时写作的原始状态——在经过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训练的学者看来,这是很虚妄的一个概念”;而他所做的“更多的是要把文化生产机制、强势话语运作过程展现出来,把外围解读和对文本内在张力的阅读连接起来,充分展现出过程的多面性和复杂性”^②。但这种“多面性和复杂性”是否有益于我们对“文学性”的更深理解?我们看到,“再解读”的实践建立在“想象”的预设条件基础上:

阿尔都塞有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要求我们不断想象某个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和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的,也就是说,任何历史文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环境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甚至可以说没法解决的问题。那么,通过一种想象方式,把原来那个问题挖掘出来,这可以说是“再解读”批评策略的一个基本冲动。^③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想象”缺乏中介。用80年代的流行术语来说,在这种方法里,和感受、体验关联在一起的“形象思维”和作为一般性的认识过程的、包含更多理性的理解的“逻辑思维”之间关系不清。它们之间缺乏中介:一种“历史性的思维”。

当前,一些学人已经指出,在经过近三十年的“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实践后,我们今天到了新一轮“反思之反思”和新一轮“重写”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应该区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和新

① 参见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5页。

② 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3页。

③ 李凤亮、唐小兵《“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第37页。

历史主义的“历史性”:必须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永远历史化”的教导相区别。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性”是认为既然历史已经不可知,那么只能通过对它加以“人性化解读”,于历史人物和场景上投射我们(被当前的历史状况所限定)的欲望和心理,来“想象”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误置的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化”则认为,历史本身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本体,但对于它的理解只能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充分理解一切“人性”作为社会性都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化,必须以重建历史现场的精神,体认其时其地的社会。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这意味着不是仅仅为讨论文学文本提供历史和社会的语境,而是通过研究文学文本和历史经验的互动来深入。

那么,如何进行这种互动的过程?换一种方式说,何为“中国的现代”?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个社会现代性又怎么体现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中?

二、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西方近几十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批评话语以及以新历史主义观念进行文本评析^①。而这既能产生一些洞见,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解构主义把历史发生当作可以随意塑造的叙述,而后殖民批评是在异域历史经验中生成的理论总结,新历史主义则建立在对今人的“普遍人性”的理解立场上不能自拔,因此在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历史时,会产生许多的盲点和错误。那么,应该操持何种理论方法进行探讨?

^① 参见拙作《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正如我们在起始所言,应当摒弃以后现代主义的“想象(史学)”和创作观为基础的方法论,而寻找文本创作和社会的历史的经验之间的更恰当中介。如果说“想象”不能也不足以成为这种中介,那么什么才是作家创作中连接现实发生和个人创作“想象”的中介?这就是杰姆逊提出的“政治无意识”,后者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产物,积淀在作家的潜意识中,表现在他观照社会的立场、方法、角度和态度中。同一个事件,在不同政治意识和无意识中,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和表现方式。因此,作家的小说生产与其在意识形态空间的立场密切相关。

但我们对文本的分析并不因此与分析作家的政治立场直接挂钩;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再次掉入缺乏中介的陷阱。相反,我们的分析仍然通过文本进行,从文本显现的症状中来窥视作家的政治无意识留下的痕迹。因为文学文本中包含了现实和历史的潜文本,后者暗伏其中,构成了现实社会-历史和文学呈现间交相往来的另类中介。

具体地说,现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在此中我们可以以形式的、同时也是批判性的方法检视作家对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挪用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将“小说”作为一个文学和思想构造,在其中各种“新文化”得以表达自身。小说文本的“风格”或“形式”在此情况下,成为作家寻找社会和象征的确定性体现的“社会性象征行为”和“政治性行动”。这种历史/政治阐释学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经验和现象在文本中的显现的历史化:历史经验和现象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存在,作为原料,它形塑和结构了表达的形式规则。或者说,历史性内容是小说文本内在的“潜文本”,因为每个文本都是重写或再结构此前的历史材料。当现实被文本拖入文本的形式结构,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时,真实世界变成了文本的内容。

这种方法是历史导向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只是注重实证因果关系研究,或者实证主义的、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影响的考察。它